

社会文化与旅游人类学·译丛 | 主编 [美] Nelson Graburn 彭兆荣

Athropology and the Age of Tourism

[美] Nelson Graburn 著 赵红梅等 译

人类学与 旅游时代

长期以来,人类学有一种传统,即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事件与习俗,将之视为一种标志物,标志着自然和社会的时代变迁,并认为它们是生命本身的界定者。这一观点部分地源于徐尔干有关世俗与一般的经历的学说。这两种状态的交替及其过激的重要性,于1898年被莫斯首次使用。他把它运用到对几乎所有祭祀仪式的分析中,强调离开世俗并使之神圣化的过程。这种神圣性使参与者进入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奇异的事会发生,反之就是重新返回世俗生活后的去神圣化的过程。利奇在《时间与错觉》一文里说:神圣和世俗有规律地交替发生,标志着社会生活的主要阶段或事件,它时间本身流逝的一种测量,每年是以年度节假日(如圣诞节)来标志的,如果没有此类事件发生,很可能就会出错,感觉仿佛被时间欺骗了。“时间是以一系列周而复始的反差事件为标志的”这一概念有人看待时间的最基本的方法。一年的度过,是以一系列节假日作为标志的,每一个节日都代表着一个“从正常的世俗状态转变到非正常的神圣状态,再返回世俗状态”的过程。这个时间流动存在一

旅游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现象，
这是人类学涉足旅游的基本前提，
惟其如此，见仁见智的文化解释才风起云涌。
乍看之下，纳尔逊·格雷本教授的旅游人类学研究涉猎甚广，
但对旅游现象之象征意义的终极探询，才是其研究的主旋律，
譬如将旅游视为人生礼仪的世俗象征，
以此解读旅游本质或深层的旅游动机。
本论文集即是一位旅游人类学先驱对旅游现象的“觉我、觉他”之言，
因此，同样需要读者见仁见智的评鉴。

上架建议：人类学/社会学

ISBN 978-7-5633-8654-3



9 787563 386543 >

定价：46.00元

社会文化与旅游人类学·译丛

主编 [美] Nelson Graburn 彭兆荣

Athropology and the Age of Tourism



人类学与 旅游时代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8-1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学与旅游时代 / (美) Nelson Graburn 著; 赵红梅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6

(社会文化与旅游人类学. 译丛)

ISBN 978-7-5633-8654-3

I. 人… II. ①N…②赵… III. 旅游业—社会人类学—研究 IV. F59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215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中核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里街 310 小区 邮政编码: 541213)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28

印张: $17 \frac{8}{28}$ 字数: 400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2 000 册 定价: 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一

我非常高兴为将要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文化与旅游人类学译丛”作序。毫无疑问,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密切关注的现代中国快速发展的各项事业中,旅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我希望这一套反映欧美旅游人类学研究状况的译丛有助于丰富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而非削弱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在理解和研究这一全球化现象中业已作出的贡献。

与日本和印度一样,中国在历史上的旅行与旅游,诸如朝圣、宗教、贸易以及政治性的统治过程等,具有悠久而复杂的历史。(Graburn,1989,2001)在古老亚洲文明的类型中,这些“具体的旅游”——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智慧的旅行”——已经大量地以传统的标志性表述和形象出现在诗词、书法、装饰画、口述传统以及民间各类形式的收藏和记录当中。这一切都成为“想象的”民族和地缘性精神家园的丰富遗产。虽然贫穷的民众很少能够外出旅行,多数人祖祖辈辈只生活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然而,人们的旅行意愿以及对外界了解的渴望并未泯灭。

自1979年以来,旅行之风日盛,中国的国内旅游每年以数以万计的出游人次快速增长。在80年代,甚至在外汇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在以获得外汇收入为重要目的的竞争活动中,旅游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今天,中国的国内旅游蓬勃发展,并出现了旅游形式的多样性特征,借用厄里的“集体注目”(Urry,2002),旅游观光事实上成为一种朝圣——第一次以非经验性旅游见证民族的多样性。(MacCannell,1999)然而,正如史密斯(Smith,1989)所指出的西方旅游的历史那样,中国的大规模的群众旅游中已经出现了类型化现象:个性化旅游、豪华旅游、探险旅游以及近期升温的生态旅游等,都反映出财富积累和社会价值在过去25年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和差异。概言之,中国已经进入一种“旅行文化”(Clifford,1997)的时代。

中国的旅游人类学家们在现代和后现代现象面前已经在整体上反映出



了他们的研究特点。尤其是建立在怀旧基础上的旅游形式,比如毛泽东故居和其他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以及那些具有祖先崇拜色彩、带有谱系意义的地点等,都成为重要游览景点,并通过某些餐饮、仪式和社会化活动唤起某种历史记忆。与此同时,那些追寻具有遗产价值的地方及景物以超越城市范围和快节奏生活方式的旅游形式也随之兴起,给广大乡村引入了诸如手工艺品制作、产品复制和生产方式模式化的变化。另外,许多超越历史经验的当代中国中产阶级游客,围绕着带有未来主义明显特征和快速变化的城市景观参与他们的旅游活动,包括大型的庆典和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样的历史性事件,而那些在中心边缘的、外围的、小族群的旅游则以那些大/中心城市的旅游时尚和价值为榜样,去体现和实现它们的旅游消费文化。然而,乡村旅游,特别是那些在广大内陆落后地区的旅游,或许才是一种摆脱贫穷,或反贫困的最有效形式。在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贵州省旅游局局长杨胜明女士和张小松教授,他们所开展的协作性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已引起了中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关注,并得到了财政和资金的支持。

中国的海外旅游在最近一个时期比起国内旅游呈现出更加快速的发展趋势。20世纪90年代,那些追求舒适快乐的旅游和海外旅游蓬勃兴起,其中,学者、商人和政府官员成为这些旅游形式的代表阶层和群体。在过去的15年里,中国政府已经与许多外国政府签订了包括允许中国公民出境购物和消费等活动的旅游协议。截至2000年,中国的海外旅游在近30个作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的国家的人数达到了1500万人次。在未来15年里,预计将有大约一亿中国公民前往超过100个国家去旅游。中国的出境游客已经超过日本赴海外旅游的人数。这些中国游客出境旅游与日本早期的海外旅游的情况大致相同,即多为团队旅游,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游客通常带小孩一起出行。

与中国游客出国旅游同步增长的是外国游客到中国的旅游,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人数迅猛增长,预计到2020年可达一亿两千万人次。在这些游客中主要有三个不同的人群:1. 海外华人、华侨。他们通常熟悉中国语言,了解中国基本的历史和地理,对他们而言,某些地方具有特别的情感和“寻根”意义。2. 日本人和韩国人。他们在海外游客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因为他

们可以分享东亚历史,以及佛教和道教文化背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可以阅读汉字。3. 其他的游客,就是那些所谓“真正的外国人”——来自南亚、东南亚、西方(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欧洲等)的游客。一方面,中国的旅游产业在诸如语言、舒适性、饮食等方面已经迅速地适应和满足了这些海外游客的需求,这在许多景区和景点都得到了体现。另一方面,中国的中产阶级游客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他们的口味,以寻求更多的旅游体验、经历。

中国的人类学家有很长的浪迹天涯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职业经历,然而,在一段时间里这种学术性和职业性的部分一度被迫停止。此后,就像其他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那样,他们的工作融入到了整个民族的发展中,其中包括引人注目的旅游业。中国的学者陆续开始了他们的海外学习和研究经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非常有幸作为“主人”接待了六位来自中国的人类学家。在西方,他们出色的学习和研究已经得到了检验,然而,他们并不囿于西方的方法,而是迅速将西方有用的东西与他们自己所认识和接触到的旅游现象(中国的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避免使自己的研究成为西方人类学的“亚类”:比如张晓萍近期在《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一书中关注那些弱小族群在旅游时代所面对的威胁和境遇方面的成果(2005),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2004)表明中国的旅游人类学家也正在使自己成为现代旅游人类学批评中的一分子。虽然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在国家的发展战略中还不能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相对于旅游业之于旅游作为一种文化经历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而言,中国学者们的探索工作与中国旅游的发展以及地域的发展一起会越来越体现出他们独立性的创造价值。

纳尔逊·格雷本*

* 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H. Graburn),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教授,国际旅游研究院创始人。

总序二

我们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所欲追求的真理，只有在把那真理本身和追求过程的废料分别开来以后，才能显出其价值。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

旅行与人类的关系可谓早矣。人之进化，手脚分化、分工，行旅便为自然人的基本要素。人与其他动物（“会动的生物”）就此而论皆属同类；不同者，人的移动是动机性的、计划性的和可塑性的。其他动物，如候鸟的季节性飞翔，有些鱼类定期觅食产卵，部分动物随着季节变化长途奔徙，以维持单体生命和种群的延续。这些迁移，我不以为是旅行。如果以上凡举意在辨识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异的话，那么，人类的旅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品质，那就是文化。它主要区别不同人群的差异。不过，旅行之于文化要繁杂得多：人们为什么出行？谁在旅途？何时出发？去往哪里？结果如何？这一切在不同的族群与文化中表现出迥然不同的价值与认同。今天，“地球村”使世界变小，旅游已经超出时尚成为人类基本的生活内容。人类学对于人类这样的变化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旅游人类学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承担起这样的探索使命。逻辑性地，人类学的旅行研究把不同社会、族群的旅行所包含的文化异同以及对社会的作用、影响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

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表述中，“游”演绎着一体双面的价值。一方面，它强调着与数千年农业伦理所契合的理念——与土地家园的亲密友好关系：安居乐业，知安乐土，家园生态，“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与此文化脉络相吻，“游”反映出与之相反的道德价值和悲剧色彩——离散的悲凉感：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离土离乡的寂寥惆怅……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主题便包含着“离愁”、“思乡”与“闺怨”。与这样的价值主张相辅相成，“游手”、“流氓”、“浪子”等便沦为反常、异态甚至负面的教化典型。



另一方面,“游”又体现出飘逸高远的深邃,传达对“道”的哲学求索。一篇《逍遥游》成为经久旷世的研讨课题,演变为费解的“不可庄语”的神话哲学命意。鲲鹏者,“不知其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以大鹏的飞翔比喻神游,去寻道,去求索,去幻化,去想象,去逍遥,去超越;行巫仪,像日神,似酒神……不可言尽。楚辞之精髓在以高翔的性灵巡游去追求超凡脱俗的政治理想,大美而大悲。屈子的诗文即为代表。“离骚”既是“遭忧”,又是“别愁”,更是“求索”,是理想破灭的心灵解脱。《远游》作如是说:“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总之,“游”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表述中,有“道”之义疏,有脱俗的旨趣,有功名的求取,有浪漫的情愫,有抑制的排遣……

可叹的是,旅行文化在中国正统的经世传统中素不被重视。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在于中国文化的务实性决定其重功利、重结果,从而忽视了实现理想、功名和志向的外在形式与形态。从帝王的出巡、孔子的周游、英雄的征战、“旅”(《说文解字》释:“旅,军之五百人为旅。”)到《山海经》的异述等都不甚关注“游”的行为,看重的是“游”的结果。惟徐霞客的“游记”、玄奘的西历取经较重旅途的经历。可惜的是,重“游”者一般不入正史。至于外来宗教,特别是佛教的传播、驻足、生根、变异,民间宗教自行其道,“妈祖”盛于民间,“分香”传延,远及海外,都囿于地方,承于乡土……

中西方交流史——不妨视为旅行文化的交流史:马可·波罗、利玛窦、艾儒略等西人前仆后继前来中国。始自18世纪,迄19世纪初,西方大兴中国文明的崇信之风,法王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为之选诵的神圣经文中竟有“圣人孔子,请为我们祈祷”(Sancle Confuci ora pro nobis)之句。中华的昌盛,帝国的辉煌通缀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抱负:戍边、安抚、平乱、筑城、和亲、朝贡、郑和下西洋……近代以降,从西方的“红毛番”、“洋鬼子”到“洋人”的形象和指喻变化,“西学东渐”演变轨迹渐使中华帝国在衰微中自惭形秽。大批英才俊秀前往西方寻求真理,事“洋务”、购“洋枪”、禁“洋烟”、拒“洋人”……华人华侨下“南洋”讨生活,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哪一桩、哪一事不与“旅行”有关,与“交通”有关?

西方的旅行文化更是贯穿着整个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地中海文明的滥

觞,海外拓殖、争夺航路,城邦政治,科学的发端,十字军东侵,骑士之风,航海冒险,发现新大陆,“三角贸易”,“伟大的旅行”,“伟大的迁移”,“五月花号”,宗教使命,“东印度公司”,“鸦片战争”……不能赘述。近些年“旅行文化”(traveling culture)更成新宠,仿佛哲人之顿悟,历史之造化,传统之“发明”。旅行文化很快发烧发热。“东方主义”者萨伊德(Said, E.)述“旅行理论”(traveling theory),把它当作对“权力话语”、对“后殖民主义俗世批判”的一种锐器;克里福德(Clifford, J.)从人类学批评史的角度探索旅行文化中“旅行/居住”的传统表述与文化认同关系;普拉特(Pratt, M. L.)则把现代旅行文化置于殖民者与殖民地的“边界地带”,以凸显“霸权与反霸权”的抗争主题;罗杰克和厄里(Rojek and Urry)的“旅行文化”却强调现代旅游的社会背景与属性的互动:移动性、文化与物质之间的相关与变迁关系……

旅行文化研究之兴与当代旅游之盛互为你我,是为不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旅游以其独有的方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种产业。这一切都反映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如所周知,旅游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诞生几乎是最为晚近的。狭义的旅游人类学,即指严肃的、专门从事人类学的旅游研究直到20世纪中叶才宣告出现。现代性的基本属性被公认为移动性,它根本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这一切皆与旅行与旅游分不开。麦坎内尔在《空聚场》(Empty Meeting Grounds)中认为:“人们浪迹天下的意识在旅游行为中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建立完整世界中的永久性家居生活。”我们似乎可以通俗地转述为:现代社会“稳定”的家居生活是通过不断“移动”的旅行方式获得的。人在旅游,文化宛若附体的魂魄,也在旅游。“文化”并非不着边际的东西和泛指,它可以附着于人群、性别、阶级、价值、观念、资本、商品等进行传播和再生产。现代社会的“移动性”打破了既往的“边界”:资金、资本、观念、形象、信息、人群、物品和技术无不构成移动的景观。

现代旅游的观念和行为无法须臾挣脱文化的羁绊,特别是现代旅游,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大规模旅游产业的情况来看,都包含着长时段历史传统的纽带和短时段“时尚”的价值特征。克雷克(Craik, J.)试图厘清:旅游作



为一种文化,对发生在文化领域里的一系列矛盾现象能够起到传承和舒缓作用。同时,文化旅游本身并非就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和事实,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在当代的旅游活动中它包含着新的品质而已。在她那里,“文化旅游”(cultural tourism)被解释为“通过习惯性的旅行,使游客进入到其他文化和其他地方去了解当地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方式,遗产和艺术;以直接的方式真正了解这些文化以及它们在历史语境中的表现”。而“旅游文化”(the culture of tourism)则是“最大限度地获取旅游文化的产品价值,重新确定游客的经历和经验,确定旅游的文化影响,适应旅游产业的文化变化”。所以,当代旅游应是“融文化于旅游与游客,融旅游与游客于文化”(moulding culture for tourism and tourist, and moulding tourism and tourist for culture)的共生现象。

人类学其实是一门兼容旅行文化的学问,其“商标”是所谓的“田野作业”。这也是民族志研究的基础。因此,人类学家把在田野工作中的“旅行”当作一种特别概念和习惯行为;它包含田野工作者自愿离开家庭到一个异地去生活和工作,以获取所需要的东西,包括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和科学方面的材料。“田野”本身就是一种松散的、有目的地的、长时间的旅行活动。从学理上看,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把“田野”视作一个异文化的“场域”(field);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田野”被当作一个静态的、封闭的、落后的、族群和空间的假定和规定。今天,人类学家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一个观念上的危机和范式上的挑战,这是因为他们清晰地看到现代旅游现象与社会的流动性是一个紧密结合的产物。坚持秉承传统的对封闭、小规模、静止、简单社会的研究和方法已经无法适应对现代旅游现象的调查和研究。一批人类学批评家先后提出了各种新的主张,如“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后民族志实践”(post-ethnographic practice)等。这种带有“范式变革”的转型,不仅意味着民族志研究在族群和传统学科领域受到了挑战,同时也是对所谓“表现危机”(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的回应。简言之,人类学对旅行与旅游的研究将促使民族志研究的另一次变革。

从旅行到旅游,从传统到现代,从观念到行为,从表现到表述,旅游人类

学不啻为一门新的学科与学问,值得开辟,值得探索。欧美在此领域的研究走在我们的前面。鉴于此,我们选译了一批重要著作奉献给读者,借以开启一扇窗户,使我国的学者和读者有机会了解西方旅游人类学的成果。同时,我们希望藉此提供一个反观的借镜,相信对我国的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学、旅游学等的研究和学习都大有裨益。

彭兆荣*

* 彭兆荣,厦门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系主任、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序言

格雷本教授嘱我为他的旅游人类学论文集作序，我心忐忑。为大师写序，晚辈焉有胆量？惟先生交达的任务，仿佛当年老师在伯克利布置的课业，不完成便无颜见先生——诚惶诚恐。

2003至2004年，我承格雷本教授的美意，应邀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鉴于我国旅游人类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在美期间，我跟着格雷本教授学习旅游人类学，梳理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知识谱系，并将这一阶段学习、研究、阅读的心得结合一些国际、国内的案例，完成了《旅游人类学》一书的写作，并很快于2004年在民族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为了使我国的学者有机会更多地了解欧美旅游人类学的发展情况，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些重要著作，于是想在国内组织出版一套《社会文化与旅游人类学译丛》。我将此意告诉格雷本教授，他热情鼓励我并答应配合出版社联系相关著作的版权事宜。为了得到学者的支持，我也与包括张晓萍教授、杨慧教授、宗晓莲博士等在内的一批学者交流意见，请他们共同完成翻译工作。经过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张民先生充分协商后，这一工程正式启动。2004年7月，我与格雷本教授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旅游研究院双年会”（2005 *Bienni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Study of Tourism*）后，我带着他到四川、贵州、广西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其间专程到桂林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商谈译丛的组织与签约事宜。格雷本教授的这部论文集即是译丛中的一部。

格雷本教授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资深教授，北美民族学赫斯特（*Hearst*）博物馆馆长，国际旅游研究院创始人，加拿大大学研究



会主席,是国际公认的少数几位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之一。他的著述颇丰,单是在不同国家发表的学术论文就多达 225 篇,涉及的领域也很多,包括因纽特人研究、宗族研究、博物馆学、原住民(少数民族)符号研究、生态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原始宗教、物质文化、遗产学等。当然,格雷本教授享誉国际学术界的成就无疑当属旅游人类学研究。此次我们选译的文章包括《旅游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ourism*)、《日本的文化多元化与旅游业》(*Multiculturalism and Tourism in Japan*)、《东亚、大洋洲的旅游与文化发展》(*Tourism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and Oceania*)、《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旅游民族志》(*On Tourism Ethnography*)等,从旅游人类学的学理、学科、学术等方面进行了阐释,皆属于该学科的代表作品。

格雷本教授接受过最好的人类学训练并进行过完整的“异文化”田野作业。他就读于英国的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硕士研究生学业是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完成的,博士学位是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拿到的,从 1964 年开始就一直在世界名校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人类学系工作至今。他还经常参与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旅游组织等)的工作,主持一些国家政府以及一些应用人类学方面的机构和基金会(如加拿大自然科学基金会、日本大阪博物馆等)的重要研究项目。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一位优秀的教授,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更是一位用眼、用心将爱付诸行动的旅行家。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他把旅游人类学研究视野从日本和东亚部分国家转移到了中国。从 1999 年开始,格雷本教授每年都到中国来。在中国,他不辞辛劳,足迹踏至西北的新疆、陕西,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广西,东南的福建,华南的广东等。他以近 70 岁的高龄深入边远地区,参观民族村寨、自然遗产地、各类博物馆、旅游景区。他或是参加国际会议,或是参与指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的项目,或是深入人烟稀少的民族地区,或是观察珍稀物种(如大熊猫)的栖息地,或是调查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规划的实施

情况,或是为地方政府规划“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献计献策,或是亲临指导旅游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他还为我国的人才培养尽心尽力。今天,活跃在我国旅游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中有不少都是格雷本教授的学生,比如张晓萍教授、杨慧教授,本人也非常幸运地得到格雷本教授的教诲;现在还有几位中国年轻学者正在伯克利学习,师从于他。他还把他的一些美国学生介绍到中国来做田野,从事项目研究。他与我国学术界的相关学者保持着良好的学术关系,比如中山大学的旅游社会学家王宁教授。当然,任何一位中国的人类学家到伯克利,只要有可能,格雷本教授都会与他进行交流。他来中国,一方面是出于喜欢、出于热爱,在我看来,更重要的还是源自他的学术知性、悟性与理性。中国的大众旅游作为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动机”,与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环境、资源、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同时,中国的旅游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为环太平洋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案例。

格雷本教授的旅游人类学论文集汇集了他在这—领域里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引言、旅游人类学的基础理论、日本国内的旅游研究、东亚及其他地区的旅游研究、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人类学的方法论六个部分。从这些论文的构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我国旅游人类学现状的了解之深入。其中不独有旅游人类学的基础性学理,还有以旅行-旅游为基础的活动方式、行为对于传统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挑战与变革意义,有对当前世界范围内兴起的“遗产热”相关方面的独到研究,有我国的近邻日本近几十年来旅游发展的案例借鉴,有东亚及其他地区旅游发展战略的情状,融理论与方法、遗产与物质、区域与战略、个案与实践等为一体。本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格雷本教授在旅游人类学研究方面的成就,相信它能够成为我国相关领域研究者们的良师益友。

知之为之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敢妄言,不复赘语。是为序。

彭兆荣

2006年6月26日于厦门大学海滨寓所

目 录

001 序言

001 引言 生命的历程

001 一、最初的记忆

006 二、体验因纽特人的艺术：出口与旅游艺术品

010 三、瓦伦·史密斯与旅游人类学

015 四、日本的国内旅游

016 五、比较的旅游人类学

017 六、海纳百川的成熟：因纽特、日本及其他

020 七、结束语

023 八、尾声：未来

029 第一章 基础研究

031 第一节 第四世界的艺术品

073 第二节 旅游：神圣的旅程

090 第三节 教授旅游人类学

111 第四节 旅游人类学

143 第二章 日本国内的旅游

145 第一节 当今日本的过去——当代日本国内旅游的 怀旧与新传统主义



163	第二节	日本乡间的工作与娱乐
181	第三节	宗教旅游及京都寺庙税收罢工
199	第四节	国内旅游何时国际化? 日本的文化多元化 与旅游业
227	第三章	东亚与其他地区的旅游人类学研究
229	第一节	旅游与色情
237	第二节	东亚、大洋洲的旅游与文化发展
268	第三节	当代东亚的旅游与人类学: 几点比较
289	第四章	博物馆与物质文化
291	第一节	日本国内旅游的物质象征
304	第二节	一种认同的诉求: 旅游与博物馆
311	第三节	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329	第五章	理论与方法
331	第一节	旅游、现代性与怀旧
355	第二节	旅游者的重新定位
370	第三节	作为仪式的旅游: 旅游的一般理论
386	第四节	学习如何消费: 何为遗产, 何为传统?
414	第五节	旅游民族志
441	附录一	格雷本谈中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453	附录二	译名对照表
467		译后记